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三皇考

顧頔剛 楊向奎 / 著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  
【史學】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三皇考

顧頡剛  
楊向奎◎著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三皇考 / 顧頡剛, 楊向奎著 · 一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12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 / 許嘉璐主編)

ISBN 978-7-203-08705-2

I. ①三… II. ①顧… ②楊… III. ①三皇五帝時代—考證  
IV. ①K210.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205958號

## 三皇考

主 編 許嘉璐

著 者 顧頡剛 楊向奎

責任編輯 梁晉華

出版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

郵 編 030012

發行營銷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傳真) 4956038(郵購)

E-mail sxskcb@163.com 發行部

sxskcb@126.com 總編室

網 址 www.sxskcb.com

經銷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印廠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700mm×970mm 1/16

印 張 22.5

字 數 237千字

印 數 1—3000冊

版 次 2014年12月 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2月 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203-08705-2

定 價 50.00圓

##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編委會

總主編 許嘉璐

編委會 王紹培 王繼軍 許石林 李明君  
汪高鑫 趙勇 梁歸智 樊綱  
(按姓氏筆畫排序)

總策劃 越眾文化傳播·南兆旭

出版工作委員會

主任 李廣潔

副主任 姚軍 石凌虛

委員 周威 梁晉華 徐勝 顏海琴  
張文穎 秦繼華 馮靈芝 張潔

設計總監 李尚斌

設計製作 王秀玲 何萬峰 歐陽樂天

## | 出版說明 |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選取一九四九年以後未再刊行之近代名家學術著作共一百二十冊，編例如次：

一、本叢書遴選之著作在相關學術領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學術研究方向、方法上獨具特色。

二、為避免重新排印時出錯，本叢書原本原貌影印出版。影印之底本皆經專家組審定，原書字體大小，排版格式均未做大的改變，原書之序言、附注皆予保留。

三、本叢書分為八大類，以作者生卒年編次。

四、為使叢書體例一致，本叢書前言後記均採用繁體字排版。

五、個別頁碼較少的版本，為方便裝幀和閱讀，進行了合訂。

六、少數學術著作原書內容有個別破損之處，編者以不改變版本內容為前提，部分進行修補，難以修復之處保留缺損原狀。

七、原版書中個別錯訛之處，皆照原樣影印，未做修改。

八、所選版本之抽印本頁碼標注，起始至所終頁碼均照原樣影印，未重新編排標注新頁碼。

由於叢書規模較大，不足之處，殷切期待方家指正。

# — 總 序 —

## 披沙瀝金，以爲鏡鑒

◇ 許嘉璐

多年來有一個問題始終在我腦中盤桓：爲什麼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短短的幾十年裏，中國的各個學術領域竟涌現了那麼多大師級的人物？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爲重要的現象，我認爲，如果不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們撰寫的近代學術史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缺乏靈魂的。後來我知道，著名人類學家克羅伯曾提出過一個問題：爲什麼天才成群地來？看來這種現象的出現並非中國所獨有，思考其所以然的也大有人在。而在那一次世紀之交中國的情況，似乎應驗了“天才成群地來”這個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問。錢學森先生曾從相反的方向提出了相同的疑問：爲什麼我們這個時代出現不了杰出人才？後來人們稱這個問題爲“錢學森之謎”。

要回答這些疑問不是件容易的事。與其迅速地囫圇地探尋，不如先多了解那些讓中國近代學術（應該包括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史上閃耀着光輝的大師們的作品和自述，從而在腦海里盡量“復原”他們所處的環境和在那種環境下的心理路徑，從中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啓示。

有一點是顯然的，這就是他們雖然都已遠離塵世而去，但是他們獨立思考的品性、求知治學的真誠、困厄窮愁中對節操的堅守，恐怕是他們共同的主觀因

素，一直影響到現在，而且將會永遠留存下去。

就思想界、學術界而言，二十世紀上半葉是一個新說和舊說碰撞，中學和西學融匯的大時代。那時的學人極為重視言行操守，同時具備現代知識分子的理想信念；他們的學術研究十分純淨，絕少功利因素；他們的視界開闊，以包容的心態和嚴謹的風格造就了成果的大氣與厚重。至於在客觀因素一面，他們實際是在用工業化時代的事實解說着太史公所說的名山之作“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困厄苦難使得他們“皆意有所鬱結”。這種鬱結，幾乎和個人的名利毫無牽涉，他們永遠不能釋懷的，是民族的存亡、國運的興衰、民衆的福禍和文脈的續斷。

那個時代也是近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中西古今學術調適、創新的時期，學術方法上的交互滲透和融合、創新亦可謂“於斯為盛”。斯時之學人是要在封閉的屋牆上鑿出窗子的勇士，是使人能夠看看外部世界的第一批導夫先路者；或者可以說，他們是在“意有所鬱結”時“彷徨”和“吶喊”的“狂人”。

相對於那時的哲人們，後來者是幸運兒。現在的形勢是，近三十年來學界空前繁榮，衆多學科有了長足之進，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學界有了更新穎、更廣闊的國際視野，似乎接續上了百年前的學壇盛事。但細想想，“古”與“今”還是有差別的。其異，主要不在於世界情勢、學術進展、工具改善這些客觀存在，而在於在廣泛吸收各國優長的同時，自身文化的主體性越來越受到重視，換言之，“拿來主義”已經延長了“拿來”的程序，加上了試用、甄別、篩選、吸收、融合、成長。就我孤陋所見，在當今地球上，面向所有異質文明，努力汲取我之所缺，其範圍之大和心態之切，似乎無出中國之右者。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已經超越了前輩。但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學術，特別是人文學科，其職業化、“沙龍化”和功利性，以及隨之而來的浮躁病却嚴重了。從這個角度說，是不是我們已經後退得够可以的了？而這是不是我們這個時代出不了大師的原因之一呢？

民國學術界的特點之一是極為注重對傳統的反省、批判與繼承。他們對傳統文化盡最大的努力進行整理和研究。一方面，由於戰亂頻仍，民不聊生，學者們擔起了讓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的歷史責任；另一方面，他們要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理、挖掘來重振民族自信心。這一時期對傳統文化進行整理的全面而深入是前所未有的，舉凡文字學、語言學、經濟學、法學、哲學、政治制度、書法繪畫、金石學……規模之宏大，研究之精微，令人嘆為觀止。

民國學術推動了現代學科體系的建立。在對傳統文化整理和研究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理念，推動和建立了中國現代學科體系。例如，在對語言文字和音韻學成果進行整理、研究的基礎上開始着手規範之，建立了國語學；深入研究書法、國畫，將其融入了現代美術學科；在廢除舊有學制後逐步建立起小、中、大學較完整的科目和學科體系。

民國學術也改變了傳統學術方式，建立了新的研究範式。以現代科學考古為發端，科研的實踐和成果使中國知識界真正認識到在實驗、比較基礎上的邏輯分析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推進了中國學術的一大演變。至於我們常說的打破士大夫傳統、走出書齋到田野鄉村和市民中進行調查研究、結束了經學時代、以歷史眼光檢視儒學和諸子等等，都是確立新學術範式的努力。這一轉變，也標誌着中國學術界脫胎換骨，全面進入了現代，為此後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然，西方啓蒙運動以來，在“現代性”和“現代化”裏潛伏着的缺陷和謬誤也傳到了中國，這些不能不在前哲的著作裏留下痕迹。這並不奇怪。類似的情況，古往今來孰能免之？猶如今天的我們，誰敢自稱我之所見就是永恆的真理？在這個問題上兩個時代所異者，或許就在昔時大家創立新說或譯註西學著作，往往是懷着對學術和前哲的敬畏而為之，故而常常誤不在我；當今則往往出於對學問和他人的輕蔑，或以所研究的對象為謀己的工具，因而難辭主觀之咎吧。翻閱他們的



心血之作，這些復雜的狀況可以顯見，可以視之為我們的一面鏡子。

滄海桑田，世事變幻，歷史的動盪和時代的遮蔽，使當年許多大師的一些極有價值的學術著作被棄於故紙堆中，不能不令人有遺珠之憾。為此，山西人民出版社不惜以數年之艱辛，披沙瀝金，編輯出版這套《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凡一百二十冊，計文學、史學、政治與法律、美學與文藝理論、民族風俗、宗教與哲學、經濟、語言文獻共八大類別。所選皆為作者之純學術著作，無論是其見解、精神，抑或是其時代烙印，都是後輩學人可資借鑒的寶貴財富。他們出版這套叢書，意在讓世人不忘來程，知筆路藍縷之不易，為民族文化的傳承再增薪木。

出版社的初衷，與我近年來所思所慮近似，故願略述淺見於書端，以與策劃者、編輯者和讀者共勉。

二〇一四年七月六日

改定於自安東回京途中

# — 前 言 —

◇ 汪高鑫

中國近代的歷史，交織着多重矛盾。有傳統社會所具有的階級矛盾，有因帝國主義入侵而激化的民族矛盾，還有新舊思想觀念的矛盾，等等。正是社會矛盾的激盪，促進了近代社會的運動、嬗變與轉型，帶動了社會各種思潮的不斷涌現，進而引發了各種史學思潮的興起和近代史學的發展。一言以蔽之，近代中國史學與史學思想的發展變化，與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是休戚相關的。

民國時期的社會變遷與轉型，直接促成了民國史學的發展和史學觀念的改變以及史學方法的創新。縱觀民國時期社會變遷與史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到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第二個時期從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

第一個時期，中國社會的變遷大致經歷了從中華民國建立到北洋軍閥統治、從五四運動的爆發到兩次國內革命戰爭兩個階段。與此相對應，民國史學的發展也緊隨時代變化，明顯呈現出時代特徵。

在第一個階段，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帝制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體制的中華民國，然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權力很快又落入到袁世凱北洋軍閥手裏，中國政治進入了北洋軍閥黑暗統治時期。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一些早期提倡新史學的史家，因為對袁世凱政府抱有幻想，而參加了北洋軍閥政府，由於忙於事務性的工作，早前由他們發動的資產階級新史學工作因此被耽擱了。這一時期新史學流派的歷史研究沒有取得什麼實質性的成果。

北洋軍閥政府的獨裁統治與尊孔復古，激起了全社會的反抗，隨着維護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的相繼開展，思想文化領域反對尊孔復古的新文化運動也於一九一五年開始廣泛開展起來，“民主”與“科學”便是這一運動所打出的旗幟。與此同時，大概自一九一六年以後，隨着一些留美、日、歐學生先後歸國，帶來了各種資產階級新思想。一時間，各種西方新學說不斷涌入，如英國羅素的社會改良主義、法國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德國李凱爾特的新康德主義、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如此等等，當時中國的思想界可謂非常活躍。這些新學說、新思想的涌入，大大激發了這一時期中國史學家們的史學思想與歷史研究，各種新的史學研究方法得到介紹和提倡，史學出現了新的氣象。

從新文化運動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期，史學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胡適、王國維、李大釗等人。胡適一九一七年留美回國後，很快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治學方法上，他將美國學者杜威的實驗主義運用到史學研究當中，於一九一九年提出了“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史方法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發表了《中國哲學史大綱》這一以實驗主義研究中國歷史的示範之作，由此開啓了近代中國實證主義史學。王國維一九一六年留日歸國後，致力於甲骨文、今文和古器物考釋等的研究，一九一七年寫成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論》，是考古學與歷史學相結合的開創性的研究成果。胡適與王國維等人的史學研究與方法，開創了近代中國史學研究的新範式。李大釗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他於一九一六年留日歸國後，便積極投身於新文化運動中。當年發表了長文《民彝與政治》，從學理上論述如何根除帝制獨裁問題；次年發表了《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對北洋軍閥政府尊孔復古進行抨擊；一九一九年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開始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由此奠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觀。

第二個階段，爲中國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伐，取得了

反對北洋軍閥統治的勝利；第二次國共內戰，其間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侵華，民族危機日益加重。儘管這一時期的中國戰亂不已，國家還面臨着嚴重的民族危機，卻是民國史學大發展時期；而造就這種大發展的原因，既有五四新學術思想的持續爆發的因素，也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變遷密不可分。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民國史學的大發展，突出表現在新歷史考證學上，這顯然是對五四時期開啓的實證史學的繼續和發展。一九一九年底，胡適發起“整理國故”運動，從歷史學的角度提出“整理國故”的步驟與方法，繼續宣揚他的所謂學術求真。胡適認為，“整理國故”的目的在於學術求真，並非現實致用，並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四個具體步驟：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二步是尋出每種學術思想發生原因和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做精確的考證，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應該說胡適的“整理國故”對於歷史研究有着方法論的意義。受胡適疑古實證思想影響的顧頡剛，在史學上的突出成就和影響，是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以及創辦《古史辨》，推動中國古史的研究。顧頡剛古史辨的具體成就，除去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命題，還揭示了三皇五帝古史系統由神話傳說層累造成，打破了民族出於一元和地域向來一統的傳統說法，以及對古書著作時代的大量考訂。顧頡剛的治史宗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只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sup>①</sup>。傅斯年曾經留學德國，深受西方蘭克“史料即史學”的實證主義影響。一九二八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力宣揚蘭克史學思想。按照傅斯年的說法，“學問之道，全在求是”<sup>②</sup>，一分材料只能說一分話，史學便是史料學。王國維在這一時期的歷史考證涉獵廣博，於漢晉木簡研究有《流沙墜簡考釋》、《墜簡考釋補證》和《簡牘檢署考》，於敦煌寫卷研究有與羅振玉合編的《敦煌石室遺書》，於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貢獻尤大。在治史方法與理論上，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之“古史新證”理論，對於民國史學的影響極大。陳垣這一時期的治史集中

於宗教史和文獻學。於宗教史上，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他先後發表了《元也里可溫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襖教入中國考》和《摩尼教入中國考》，合稱“古教四考”；於文獻學上，他對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和校勘學等領域多有建樹。陳垣治史以重史源、講類例爲其特點。以上史家雖然治學方法與特點不盡相同，但都以考證見長。

這一時期“新史學”史家的史學研究與方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梁啟超這一時期的史學研究可謂多產，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七年，先後發表《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等，治史重點在學術史與方法論。與當年發起“新史學”相比，梁氏這一時期的史學研究呈現出廣疏多變的特點。何炳松在“新史學”思潮中可謂獨樹一幟，他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史學界的最大影響，便是對魯濱遜《新史學》的介紹和評論。何炳松系統闡發了“新史學”的“綜合史觀”，主張歷史研究要反映人類活動的全部，史學研究的方法應該多元化，如統計學的方法、生物學的方法等等，要綜合利用各種學科的成果特別是新學科的進展開展歷史的研究，並表達了對於歷史學的意義、價值和發展前景的看法。

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對歷史學的研究繼續做出了貢獻。一九二四年，李大釗出版《史學要論》，運用唯物史觀對歷史、歷史學、歷史學的系統、史學在科學中的地位、史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的關係、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等史學基本理論問題作了闡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一些關注中國前途與命運的學者受到困惑，於是一場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論戰逐漸開展起來。馬克思主義史家積極參與其中，郭沫若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一九三〇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這是民國時期中國第一部運用唯物史觀分析、解剖中國古代社會的著作。該書以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發展

和變革來解釋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發展的全過程，論證中國歷史發展與世界歷史發展的共同性，對中國古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獨創性的看法。參與社會史大論戰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還有呂振羽、何幹之、翦伯贊、侯外廬、鄧拓等人。但總體來看，與歷史考證學派相比，這一時期的“新史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史學派並不佔據主流。

第二個時期，中國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民國史學在這個時期的表現有兩個顯著特點：其一是緊緊服務於抗戰的需要而出現的抗戰史學；其二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得到了迅速發展，逐漸形成自己的革命史學體系。

抗日戰爭的爆發，引起了中國史學界巨大的震撼。面對中華民族出現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在第一時期佔據史學主流地位的新考證學派史家，他們過去那種一味重視學術求真，而不講究學術致用的治史價值取向，在這時發生了重大改變，開始以史學積極服務於抗戰。早在九一八事變以後，面對中華民族的危機，顧頡剛、傅斯年、陳垣等考證學派史家就開始拿起自己的史筆，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的時代大潮中。顧頡剛一九三四年創辦《禹貢》半月刊，開始高舉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旗幟。之所以要以“禹貢”為刊名，按照顧頡剛的說法，是“今日談起禹域，都會想起‘華夏之不可侮與國土之不可裂’”<sup>③</sup>。很顯然，《禹貢》半月刊的宗旨，便是要通過對於邊疆歷史地理的研究，激發全民族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熱情與決心，以達到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目的。傅斯年在九一八事變後，出版了《東北史綱》，以大量史實論證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對日本帝國主義御用歷史學家的種種歪曲史實的謬論予以駁斥。全面抗戰爆發後，傅斯年又寫了《中國民族革命史》一書，雖然是未完稿，卻已經表達了他的民族思想。該書以歷史為依據，充分論證了中華民族的同一性、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此，在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嚴重危機的緊要關頭，中華民族應該團結起來共同禦侮，要發揚中華民族百折不撓的精神，樹立起中華民族抗戰的必勝信

心。陳垣在新中國成立後給友人的書信中講到了九一八事變後他的治史取向的轉變：“九一八以前，為同學講嘉定錢氏之學；九一八以後，世變日亟，乃改顧氏《日知錄》，注意事功，以為經世之學在是矣。”<sup>④</sup>抗戰爆發後，陳垣當時身陷淪陷區，卻堅持以史學為抗戰服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史著便是“宗教三書”和《通鑑胡注表微》。所謂“宗教三書”，是指《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雖然講的是宗教，卻表現了愛國的民族情操。《明季滇黔佛教考》是表彰明末遺民的愛國精神與民族氣節；《清初僧諍記》是通過宗教史的研究，來揭露變節者、抨擊賣國求榮的漢奸；《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也是用以表彰抗節不仕之遺民。《通鑑胡注表微》是陳垣最具代表性的史學著作，也是一部關注現實的史著，書中表現出了陳垣對歷史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思考。錢穆在抗戰時期的史學研究，愛國的民族主義色彩也非常濃厚。一九三七年，錢穆寫成了與梁啟超同名史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該書以思想文化為基礎和綫索，以學術傳承為核心，通過史實證明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旨在提醒國人要重視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長處和價值，持守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保持一種民族的自信心。毫無疑問，這種民族自信對於全民族團結抗戰是非常必要的。一九四〇年，錢穆多年國史教學講義《國史大綱》出版。該書以“國史”作稱謂，反映了作者作史的民族國家本位意識。錢穆明確指出：“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立精神之所在。”<sup>⑤</sup>該書的具體內容也充分體現了這一精神，它將文化、民族與歷史三者結合起來對中國歷史加以考察，認為這種歷史發展過程即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演進過程，歷史研究的目的不僅在於弄清楚歷史的真實，更重要在於弄清楚歷史背後蘊藏的民族文化精神，從而積極地去傳承這種民族文化精神。

當然，新考證學派史家開始轉向經世致用，只是治史的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並不等於放棄了一貫的注重考證的治史方法。相反，在民國後期，這種治史

方法還得到了發展，並且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陳寅恪的詩文箋證和“民族文化之史”的論述便是典型代表。陳寅恪屬於考證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這一時期出版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是其考證隋唐史的力作。陳寅恪對於史料的運用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認為史家之於史料應該善於審定，辯證地看待真偽；同時要善於利用史料，詩詞、小說，以及禪史、筆記等，都可以用做歷史研究的材料，這顯然是一種“通識”的史料觀。陳寅恪詩文箋證的治史方法，即是在這種史料觀的指導下產生的，具體做法是以歷史記載去箋證詩文，同時詩文又可用以證史、探討史事，從而開闢出了一條新的證史路徑。一九五〇年出版的《元白詩箋證稿》，以及晚年寫成的巨作《柳如是別傳》，便是運用這種方法的代表作。陳寅恪關於“民族文化之史”的論述，其基本內涵包括政治制度、社會習俗、學術思想、文學藝術。陳寅恪的歷史觀念，是要以民族文化為根基，同時吸收外來學說，由此構建起本民族思想文化體系；而不談經濟基礎的作用，則是其歷史觀念的局限性。

這一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但積極投身於抗戰史學當中，為全民抗戰進行歷史研究，而且把歷史研究與當時的革命鬥爭相結合，逐漸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史學。縱觀這一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其一是社會史研究，代表史家有呂振羽、鄧初民、侯外廬等人。呂振羽於一九四二年出版了《中國社會史諸問題》，該書是對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的一個較為系統的總結，正如作者在新版序言中所說，該書“反映了中國新史學在歷史科學戰綫上的鬥爭過程中的若干情況，也反映了有關各派對中國史問題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及其在一定時期的發展過程，可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參考資料”。鄧初民於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二年分別撰寫出版了《社會史簡明教程》和《中國社會史教程》，兩書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分別論述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和中國社會歷史



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在《中國社會史教程》一書中，鄧初民指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前途是光明燦爛的，我們應該要“努最後必死之力，加以爭取”。侯外廬於一九四七年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一書，內容涉及生產方式、政治結構、階級關係、國家和法以及道德起源等問題，見解頗為深刻。總體來說，這些社會史著作可以被看作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史大論戰的總結、延續和深入。

其二是通史研究。這方面的成就尤為突出，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翦伯贊的《中國史綱》都是這一時期的通史名作。呂振羽於一九四一年出版《簡明中國通史》上册，如同其出版序言所說，該書“與從來的中國通史著作頗不同”，這種“頗不同”主要表現在它“把中國歷史作為一個發展過程在把握”，“還盡可能照顧到中國各民族的歷史及其相互關係”。一九四八年出版下册，在跋語中作者申明該書的基本精神是“把人民歷史的面貌復現出來”。范文瀾於一九四二年出版了《中國通史簡編》，該書的基本精神旨在將歷史研究與中華民族的前途相結合，如同作者在上册序言中所說的，“我們要瞭解整個人類社會的前途，我們必須瞭解人類社會過去的歷史；我們要瞭解中華民族的前途，我們必須瞭解中華民族過去的歷史”。這也正是《中國通史簡編》撰寫的初衷。本着這樣一個目的，該書的編寫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肯定勞動人民的歷史作用，重視探尋社會發展的規律，注意分析階級鬥爭的本質，積極反映生產鬥爭的面貌。翦伯贊於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六年分別出版了《中國史綱》第一、二册，該書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剖析了商周社會性質以及戰國秦漢社會性質的轉變，注意將中國歷史置於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在研究方法上重視以考古材料與文獻資料相結合。

其三是思想史研究，代表史家有呂振羽、何幹之、侯外廬等人。呂振羽於一九三七年出版了《中國政治思想史》，這是我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論述中國政治思想的著作。撰述的初衷，是針對陶希聖的同名著述，可以被視為社會